

28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革命史专辑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兰州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5 字数164,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70

书号: 11096·47 定价:0.96元

目 录

三八五旅在陇东·····	耿 飏 (1)
红军教导师在庆阳片断·····	李有义 (6)
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事·····	程占功整理 (11)
我在陇东工作的一些回忆·····	段德彰 (22)
我在陇东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平水 (30)
中共陇东特委工作回忆·····	陈仁麒 (40)
回忆陇东特委工作·····	李铁轮 (43)
庆环分区回忆·····	高伯祥 (51)
我在陇东工作的片断回忆·····	朱 敏 (55)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陇东工作时的几点回忆·····	贾庆礼 (59)
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琐忆·····	姚静波 (63)
回忆环县事变·····	曹玉珊 (72)
皋榆工委成立前后·····	罗杨实 (80)
忆兰州生活书店·····	薛迪畅 (93)
天水生活书店薛天鹏被捕片断·····	薛迪畅 (103)
我所知道的甘肃青年抗战团·····	罗杨实 (107)
忆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的革命活动·····	刘存诚 (118)
传播革命火种的“兰州派报社”·····	郑得堃 (124)
怀念李富春同志·····	高伯祥 (136)

记忆犹新的谢觉哉同志炉边谈话·····	高朗亭(141)
回忆马锡五同志·····	封芝琴(145)
张一悟同志革命史略·····	陆善亭 金焯三(154)
深切怀念陆云龙同志·····	罗杨实(163)
秦仪贞同志事略·····	赵定九 刘国夫(169)

记延安大学战时生活和陇东随军工作情况·····	李之钦(173)
-------------------------	----------

乔山西麓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

——记庆北苏区的失守再建转移与恢复·····	王 英(18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庆北县始末·····	李仲立 王忠堂(192)
陕甘边苏区红军干部学校始末·····	巩世铎(198)
陕甘边苏区列宁小学·····	巩世铎(201)

人民的选举 民主的典范

——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述评·····	高 文(204)
陕甘宁边区历届参议会概述·····	高文 褚宪(227)

三八五旅在陇东

耿 飏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过去的历史，不仅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今后，为了教育人民和提高人民的觉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要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坚持四项原则的教育，要把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和延安精神，以及建国初期的创业精神，教给青年一代，进一步恢复和发扬起来。从这一点来说，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我谈一点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在陇东工作时的回忆，供参考。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屈膝退让，而对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则竭力镇压，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加紧进攻。一九三三年三月和十月，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第四、五两次大规模“围剿”。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中央苏区红军八万余人，从闽西和赣南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历来学曾国藩的那一套做法，攘外必先安内，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关外调进关内对付共产党，给张学良委以“剿匪”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和邓宝珊等杂牌军队打击红军，同时达到消耗杂牌军队的目的，以坐享渔人之

利。在我们革命内部，由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盲目学习苏联，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搞军事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从一九三二年起搞AB团，名之曰“肃清反革命”。在陕北方面，中央北方局派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到陕北搞内部肃反，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都被关了起来，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许多人不明不白地消灭了，至少搞掉了三分之一。学苏联那一套“左”的做法，使我们吃了大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纠正了这一错误，把刘志丹等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放出来。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红军向川康边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党中央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反党分裂行为。张国焘阳奉阴违，擅自南下退却，另立中央，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后来发展到叛变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中央红军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时经一年，历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一个省，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击溃了装备优良的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业绩，也是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伟大转折。陕北根据地对红军长征的胜利有着重大作用，陕甘宁边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我党就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挽救祖国危亡。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党再度发

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又先后发表宣言，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赞成抗日的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蒋介石的卖国和内战政策越来越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举国人民拍手称快，一致要求杀掉独夫民贼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事变的性质和前途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当时如果杀掉蒋介石，势必引起新的内战，那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亲日派；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党中央一方面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赴西安，就解决西安事变和处理蒋介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一方面电促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二将军的主张。同时集结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准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共同对付亲日派何应钦等策划的武装进攻。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西安事变乃告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十年来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主张。

在西安事变的同时，一九三七年初，我们的部队向西安附近集结，在关中度过春节后开赴陇东庆阳。我当时在红四军，本来在三原组织“援西军”，接应西路军李先念等同志到新疆的部队回陕北。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同意我们去，我们就由三原到了庆阳。那时三八五旅一部分开到抗日前线，一部分留守在庆阳，地方武装有两个团（警备二团和七团）也拨归三八五旅指挥，分驻

庆阳、环县、华池、镇原、驿马关、宁县、曲子、合水、盐池等地。一九三九年后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调兵遣将，修筑碉堡，包围并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煽动反共宣传，侵占我镇原、宁县、正宁县城。我当时兼任庆阳城防司令，国民党偷偷地把武器运进边区内他们所占据的区、乡政府，企图组织反革命暴乱，各县的反动民团如庆阳的谭世麟等，也在暗中和我们作对。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党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又进一步提出反摩擦斗争的方针，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为了制止摩擦，我们派孙君一同志到西峰镇和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公署交涉，没有解决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偷袭我驻军，劫害我工作人员，强迫解散我农会 and 自卫队。我们忍无可忍，被迫还击，一夜之间就把合水县城夺过来，我们派了一个营把敌人二百多人的反动武装搞掉了。西华池也被我们夺过来。三八五旅司令部所在地庆阳，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我和旅长王维舟同志认为，要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庆阳县城这个据点必须夺过来。一九四〇年初，我们就把国民党设在庆阳县的一个区公署赶跑了，挖出了二百多条枪，一万多发子弹。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把国民党的反动县长、区长“礼送”出境，实际上是把这些反动家伙驱逐出境了。记得当时国民党的合水县长很坏，我们没有杀他，也将他送走了。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我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使陇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当时，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是马文瑞同志，专员是马锡五同志。我和王维舟同志都在三八五旅，王维舟同志主要负责抓统一战线工作，我负责军队的训练和生产。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不给我们发军饷，我们就按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大凤川、豹子川一带搞大生产，做到部队粮食自给。那时弹药也很缺乏，部队练兵打靶和生产结合起来，给战士每人发三发子弹，带他们到子午岭打猎，那里有豹子、野猪、狐狸等野兽，战士们只要能打获猎物，射击就算合格。我们还组织战士到盐池淘盐、运盐，不但自己种菜，也帮助农民种菜。除了打退国民党的进攻，还剿灭了几股土匪武装。陇东边区各县社会秩序良好，群众思想觉悟很高，人民生活安定富裕，军民关系亲如一家，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城乡不见一个叫化子，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比较，俨然两重天地。

一九四一年，我离开庆阳到延安学习。一九四三年回到庆阳看了一次，接着就到了晋察冀。在战争的年月里，转战于石家庄、太原、陕西、宁夏等地，再未去过陇东。建国以来，我一直从事外事活动和在中央工作，至今仍怀念陇东老区的山水和乡亲。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再次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十分正确的。陇东老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在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陇东老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应该学习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传家之宝，世代永远流传下去。

红军教导师在庆阳片断

李 有 义

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于一九三六年来到庆阳驻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他们在庆阳驻防期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事迹。

这里记叙其中的两例。

解 放 妇 女

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来到庆阳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庆阳地下县委，蔡畅同志兼县委书记并主管妇女工作。一九三七年“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第一次在庆阳举行。在部队的宣传动员下，这天广大妇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前来和红军女战士们共同欢庆自己的节日。会上，蔡畅发表了讲话。她先讲了“三八”妇女节的来历，我们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对妇女工作的要求，接着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和前线战况，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打碎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中来，要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行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去上夜校，进识字班，努力学习文化，关心天下大事。最后，她要求妇女们把缠住的脚放开，往后再不要给孩子缠了，把她们送到学校去念书。妇女们说，蔡大姐的讲

话振奋人心，年轻媳妇和姑娘们当即表示，要努力学习，积极帮助部队做好工作。

教导师成立了妇女救亡会等群众组织。妇救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广大妇女、特别是年轻媳妇和姑娘们积极参加妇救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不少人都上了夜校，进了识字班，她们跟着女战士在大街小巷刷标语。那时的标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等。有些还同女战士一起登台演戏、唱歌，如“小放牛”、“大刀进行曲”等。在反对地主剥削、实行减租减息，除奸反特，支援前线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她们的作用。

妇女开始走上社会，她们中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教导师组织妇救会的成员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在妇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视情况给以解决。

当时，在这里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婆婆虐待媳妇，丈夫打骂妻子。这种压迫妇女的现象存在得比较普遍，有些地方问题也很严重。庆阳城有一户姓杨和一户姓李的婆婆，不仅在吃穿上虐待克扣媳妇，而且随便打骂，任意欺辱，天天把媳妇关在家里，从不让与外人说话，倘若媳妇与别的男人说上几句话，婆婆便百般辱骂，甚至挑唆儿子毒打。尤其是那家姓杨的婆婆，打骂更是不择手段，从不把媳妇当人看，而她的儿子也只是听她的话，从不疼爱妻子，致使这个可怜的媳妇最后自杀了。广大妇女纷纷要求教导师、妇救会答应她们把这两家的婆婆给以必要的制裁，为被压迫的姐妹们伸张正义。经蔡畅同志同意，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把这两个坏典型游街示众。这样一来，其他虐待媳妇的婆婆以及打骂妻子的丈夫再也不敢随心所欲了，许多经常挨打受骂的妇女，从此扬眉吐

气，她们说，这才有了做人的权利。

庆阳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说“剪子挑，锥子挖，脓血滴了两马勺，疼得跪的跪，爬的爬”，以此来形容妇女缠脚的痛苦。教导师和妇救会号召妇女们放脚，广大妇女非常欢迎。在学校的女学生还成立了“剪脚布”小组，“剪脚布”小组的学生每人都给配上一把剪子，一见缠脚的同学就给剪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多少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解放妇女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年轻媳妇参加社会活动，也要遭到社会上的非议和家里人的责骂。教导师掌握到这些情况后，就派女战士深入群众，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对那些别有用心、故意捣乱的人，教导师和妇救会发动群众给以打击，从而使工作得以健康地进行。在深受妇女欢迎的放脚问题上，还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有一名叫田葡萄的女学生，她在学校被“剪脚布”小组放开了脚，回到家里，被她父亲田汉云打了一顿，田汉云说，给女人缠脚是多少年来的老规矩，哪能随便就不要了，所以，他又给田葡萄缠上了脚。蔡畅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带上当地的女教师赵兰香、边兰英到田汉云家里做工作。经过她们的耐心说服教育，田汉云提高了认识，最后才给女儿放开了脚。

斗 争 恶 霸

庆阳有大地主四家，小地主八家，还有二十四户银货家。冯玉清在全县居于首位，人们称他冯大绅士。不仅如此，冯玉清的弟弟还是国民党甘肃省常驻北京参议员。冯家除了在四乡霸占有两千多亩土地外，在许多地方还设立商业网点，连庆阳城的邮电机构也由他家经营。冯家在庆阳有六个豪华大院，百十间砖瓦房，

在四乡还有“巡视”时的住宅。由于冯大绅士财多势众，权势显赫，国民党县政府上至县长，下至一般官吏，都拍他的马屁。冯家骄奢淫逸，欺压群众，是远近闻名的大恶霸。一九二九年，庆阳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年荒，巨额的救济金全被冯玉清一家私吞，以致饿死了不少人。冯玉清残害人民，罪行累累，但由于有国民党县政府的庇护，一直无人过问，更没人敢告发。教导师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决定为庆阳人民铲除这个大害。部队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利用地主之间矛盾，让知情人出来揭发冯家的老底子。三十铺的王家彦就是被争取过来的一个，他详细揭发了冯玉清的大量罪行。在查实全部罪证后，教导师组织群众于一九三七年农历二月初七把人抓了起来。那天，教导师宣传部的戴富九同志带着自卫军和青年团的小伙子们，首先冲进冯家大院，他们朝天放了两枪，接着命令冯家人不要乱动，把冯玉清押了起来。冯家老小这时一个个呆若木鸡，男的被叫到一间房子，女的被叫到另一间房子，群众让这些平时欺在人民头上的坏东西，揭发交待冯玉清以及他们自己的罪行。随后，教导师召开批斗控诉群众大会，广大老百姓纷纷要求枪毙冯玉清。冯玉清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吓得屁滚尿流，只好低头认罪。教导师发动群众，打开了冯家仓库，给老百姓分粮。国民党县政府出面极力阻挠捣乱，教导师的战士痛斥他们这伙贪官污吏同冯玉清狼狈为奸、鱼肉乡里的罪行。他们见事不妙，只好乖乖夹起了尾巴。在领粮食中，也有少数人有顾虑，宁愿挨饿，不敢来领，经过战士们动员说服，他们才来了。对没有劳力的，战士们还把粮食背着送到家里。部队把冯玉清霸占的土地，不少都分给了老乡耕种，对侵吞的救济金，也让他全部赔上，教导师把一部分分给了群众，一部分用来办了一所医院和一个民教馆。从此，这个地方才有了西医治疗。医院

免费为穷人治病，有些难产妇女，来到医院接生，母子均安然无恙。民教馆买了好几千册书，为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起了不少积极的作用。群众把冯玉清斗倒后，教导师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土地改革。

（程占功整理）

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事

程占功 整理

陇东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曾在这儿驻防。他们在庆阳驻防期间,与当地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出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

这里记叙其中的九个故事。

我们的“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

有一天,庆城上空云雾迷漫,冷风呼啸,半晌午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忽然听见钟楼上响起了“咣”“咣”“咣”宏亮而急促的钟声,人们知道,这是八路军值班人员发出的防空警报,旋即从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敌机巨响,城里城外的八路军便紧张、迅速地行动起来,扶老携幼,掩护群众隐蔽。当时的城防司令、三八五旅副旅长耿飏同志,这时候正在南街道巡视,警报响过后,他立刻指挥此地群众向防空洞转移。忽听人说,一位姓胡的老汉还在自己的房子里呢。耿飏闻讯,即让那人快进防空洞,自己却照那人指的地点飞身跑去。

原来,胡老汉听到警报后,他想,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手脚都不方便,反正跑不动了,要别人背的话,万一暴露了目标,都

得坏事。于是，他就躲进屋子里，心想听天由命吧。

耿飏一个箭步冲进门来，二话没说，拉住胡老汉就要背他。老汉摆了摆手，说：“我知道八路军是好人，这么危险，你快走吧，我不管用了，你们可是重要的人啊！”“我们的‘重要’就是不能让你有危险！”说罢，耿飏同志不容老汉分说，就强行把他背起来，一口气送进了防空洞。

以后，胡老汉逢人就讲他被救的经过，并说：“我见过许多军队，就数八路军最好。”

（根据老干部辛廷书口述整理）

你就记下八路军

记得在我懂事以后，母亲就常常给我和妹妹讲这件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三八五旅的文艺宣传队来到我的家乡庆阳白马演出，妈妈高兴地领着我和妹妹去看戏。

剧场是临时选的一块空旷地，舞台搭在场子的一端。当我们赶到剧场时，乡亲们已经围满了，我们搬了几块石头，只好在人群后边蹲下看。八路军剧团的精采演出，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可不懂事的我们兄妹俩，却趁着母亲不在意时候，悄悄溜出了人群。我领着妹妹一会儿站在远处看看台上的演戏，一会儿到卖小吃的摊儿前凑热闹，心里真象过年一样欢喜。

突然间，天空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几架敌机一架接一架地飞来，观众一时大乱，演出停止了，八路军战士们扶老携幼帮助群众隐蔽。在混乱中，吓得我拉着妹妹哭喊妈妈。这时候，舞台上的一位女演员发现了我俩，她不顾自己安危，冲下来跑到我们跟